

「搭橋者」裨治文

李亞丁

新專欄「佳美腳蹤」系列介紹

聖經說：「報福音，傳喜信的人，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！」（羅十15）

從本期開始，我們將開闢一個新的專欄——「佳美腳蹤」系列，連續刊登近現代歷史上宣教偉人的生平事蹟與見證，以激發我們的信心、愛心和宣教之心。每提起宣教偉人，人們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馬禮遜和戴德生，但有關他們的傳記和書章已經夠多，許多人對他們已不陌生，故不把他們納入本系列中，另述他人，讓讀者認識更多來華的宣教士所作的貢獻。本期讓我們從首位來華的美國宣教士裨治文開始，追尋宣教士的佳美腳蹤，看神藉著他們在中國行了何等奇妙的事吧！

許多人都知道，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新教宣教士是英國人馬禮遜(Robert Morrison)，但第一位來華的美國宣教士裨治文牧師(Elijah C. Bridgman, 1801-1861)卻鮮為人知。他於1829年由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會(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，簡稱「美部會」)差派來華，先後在

廣州、澳門、上海從事文字宣教達30年之久。他創辦了中國第一份英文期刊《中國叢報》；參與翻譯中文聖經，並先後參與創立了中國益智會、馬禮遜教育協會、中國醫藥傳道會，以及上海裨文女校等。他也可說是美國第一位「中國問題專家」。

一、成長與獻身中國宣教

1801年4月22日，裨治文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一個農民家庭，父母皆為美國公理會教會的信



徒。裨治文13歲時，在一次佈道大會上悔改歸主，不久便進入安赫斯特學院(Amherst College)讀書。在學期間，他有機會閱讀一些關於海外宣教的雜誌，使他對海外宣教有了初步的瞭解，遂萌發出獻身作宣教士的念頭。1826年，裨治文進入安多弗神學院(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)深造。神學畢業後，於1829年9月，成為美國公理會海外

傳道會的宣教士，接受差遣前往中國宣教。同年10月6日，裨治文被按立為牧師；八天後即與雅裨理(David Abeel)一起乘搭「羅馬人號」(Roman)輪船從紐約啟程前往中國。在旅程中，裨治文記下這樣一句話：「我雖然很渺小，但我的行為將會影響許多人，甚至影響整個中國」。

經過三個多月的海上航行，裨治文等人於1830年1月22日抵達澳門，受到當時僅有的兩位在華基督教宣教士馬禮遜夫婦的熱烈歡迎。那時，馬氏夫

婦已在澳門和廣州兩地開荒工作了23年之久。一個多月後，裨治文轉往廣州，首先在馬禮遜所創的一所小教會裏做牧師，同時開始學習中文。除語言學習外，他還注重對中國文化、宗教及習俗的研究，為的是「將人的思想奪回，使它都順服基督」(林後十5)。裨治文視馬禮遜為前輩，非常尊重他。在馬禮遜的幫助和指導下，他度過學習中文和認識中國及適應生活的初期階段。

二、裨治文與《中國叢報》

由於當時中國政府禁止其臣民與外國人來往，宣教士不得公開宣教，裨治文等人只得用文字和分發書刊的方式傳播福音。1832年5月，裨治文在馬禮遜和美國基督徒商人奧利芬(D. Olyphant)的鼓勵與支持



下，創辦英文月刊《中國叢報》(*The Chinese Repository*)，目的是「喚起全世界基督徒對中國人靈魂覺醒之關注」。《中國叢報》的主要內容是介紹中國的社會、文化和地理等相關知識，也記述宣教士們在東南亞各地如新加坡、馬六甲、檳城、巴達維亞(今雅加達)等城市的宣教活動。該雜誌除報導中國語言、文化、歷史、藝術、典制、風俗以及宗教等內容外，也屢屢刊文針砭時弊，力陳婦女纏足以及吸食鴉片之危害，以致廢除婦女纏足成為西方宣教士努力的目標，並卓有成效。該報還先後刊載反對鴉片的文章48篇之多，其中有15篇為裨治文自己所寫，為中國仗義執言，並在美國激起反鴉片的浪潮。

《中國叢報》創刊於廣州，在鴉片戰爭期間曾一度遷至澳門和香港，戰後再回廣州。《中國叢報》一直由裨治文擔任主編，直到1847年他遷居上海從事譯經工作時為止。其後，先後由宣教士貝雅各(James G. Bridgman)和衛三畏(Samuel Wells

Williams)接任主編，直到1851年12月，因經濟難以為繼而停刊。從創刊到停刊前後約20年，《中國叢報》合共出版了20大卷，不僅激發了西方教會和基督徒對中國的宣教熱忱，更成為當時西方人探索與了解中國的重要媒介，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在後世則成為學者們研究1851年以前基督教在華宣教活動的主要資料來源。

裨治文不僅是美國第一位來華宣教士，也是第一位漢學家。他具有滿腔的奉獻精神、特別的語言天賦，以及對文化的透視力。他用中英兩種文字從事著述，向中西方介紹彼此的歷史、社會與文化，從而成為中西文化的橋樑。1838年，裨治文出版了他的中文著作《美理哥合省國志略》(*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*)，這不僅是一本地理書，更介紹了美國的歷史和制度，其用意在於顯明美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之間的關係。此書前後經過兩次修訂：第一次在1846年，書名改為《亞美理駕合眾國志略》，在廣州出版；另一次則在1862年，書名再次更名為《聯邦志略》(*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*)，在上海再版。1841年，裨治文用英文寫就《廣東方言撮要》(*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*)，在澳門問世，詳細描述了中國人在文藝、科技和生活等各方面情況。這部巨著面世當年，美國紐約大學(University of New York)為表彰裨治文在中美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貢獻，特授予他榮譽神學博士(Doctor of Divinity)學位。

裨治文其他中文著述還有《真假兩歧論》、《永福之道》、《復活要旨》、《靈生詮言》和《耶穌獨為救主論》等書。此外，裨治文也將中國的《孝經》翻譯為英文。

三、裨治文與中文聖經翻譯

1847年以後，裨治文移居上海，參與聖經的翻譯工作，直到1861年在上海去世為止。他曾先後參與三部中文聖經的翻譯工作，第一部是《新遺詔

書》，該譯本基本上是從馬禮遜的《神天聖書》修訂而成的。1834年，在馬禮遜逝世後不久，裨治文便開始與麥都思(Walter H. Medhurst)、郭實臘(或譯郭士立，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)和馬儒翰(John R. Morrison)三人合作，著手進行馬禮遜譯本《神天聖書》的修訂工作。1837年，名為《新遺詔書》的新約聖經在巴達維亞出版。1843年8至9月，西方各基督教差會的代表在香港舉行宣教士譯經大會，商討出版一部「不僅為各差會共同認可，亦為中國人所接受的聖經譯本」。裨治文與波乃耶(Dyer Ball)二人，以美國公理會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。大會決定對《新遺詔書》再次修訂，並且重新翻譯舊約。裨治文作為廣州/香港傳教區的翻譯委員，被委派加入專責小組，與宣教士舜為仁(William Dean)一起處理某些聖經專有名詞的翻譯。1851年，裨治文與美國長老會(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)宣教士克陞存(Michael S. Culbertson)合作，翻譯舊約聖經，同時參與《委辦譯本》新約的修訂工作。1859年，在美國聖經公會的資助下，修訂後的新約聖經正式出版。1863年，《裨治文/克陞存舊約譯本》面世，可惜的是，裨治文和克陞存都沒能看到此譯本的出版，因為他們已分別於1861年和1862年去世。

四、裨治文與中國益智會

裨治文來華之初，對中國的認識僅限於中國人只是一個「簡單、落後和無知的拜偶像的民族」。但自從踏上中國的土地後，面對異文化所帶來的衝擊，使他的世界觀得以改變，從而認識到他來中國不僅要使中國人獲得屬靈的真理，也要獲得屬世的知識，因為他相信「教育是上帝用來提升人類心靈和解放人類脫離懲罰的一種方法」。這些觀念上的改變，促使裨治文努力去協調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。

在裨治文和荷蘭傳道會(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)宣教士郭實臘的推動與主導下，1834年11月，一個為促進華人認識西方文化的組織「中國益智會」(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

Knowledge in China)在廣州正式成立。他們的目標是「希望藉著和平的手段，促使中國不論是在商業、西方文化或基督教信仰方面，全方位對外開放」。他們決意「以智慧作為炮火」，讓中國人不僅可以接觸到「現代的發現和發明所產生的最豐富的果實」，還可以認識西方國家的歷史、文化和社會制度。

中國益智會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和推廣中文書刊，藉此「開啟華人的思想領域」。除裨治文外，郭實臘和馬儒翰等宣教士，都有份參與撰寫文稿的工作。在鴉片戰爭爆發前，中國益智會已出版了七種刊物，向中國讀者詳細介紹「那在中國以外、正在改變中的世界」。後來，中國益智會亦在新加坡設立堅夏書院，出版中西書刊；同時承辦郭實臘主編的雜誌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》(*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*)。

五、裨治文與教育事業

1835年1月，即馬禮遜逝世後半年，裨治文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，以及一些在廣州的歐美商人，組成一個臨時委員會，籌備成立「馬禮遜教育協會」(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)和草擬章程等事宜，裨治文擔任該臨時委員會的召集人和書記。1836年9月28日，「馬禮遜教育協會」正式成立，裨治文被選為理事會執行秘書。他在成立典禮上致詞時說：為要完成馬禮遜對中國教育事業的未竟之願，該組織要在中國興辦西式教育事業，因為當「教育在中國普及化之後，全中國的人民將會受益，而我們的傳教事業最終也會成功」。從中可見該會宗旨之一斑。

1839年11月4日，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府「馬禮遜紀念學校」(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)在澳門正式開學。校長為鮑留雲牧師(Rev. Samuel Brown)，他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，且在紐約已有多年的執教經驗。馬禮遜紀念學校以英語授課的科目有地理、歷史、算術、代數、幾何、生物、化學、音

樂和初級機械原理等，當然還設有聖經課程。該校學生雖因不習八股文章而不能參加科舉考試，但他們畢業後可進入香港的洋行充當買辦或譯員。1845年9月，馬禮遜教育協會舉行第七屆年會，裨治文被選為會長。

1847年6月，裨治文攜妻伊莉莎(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)移居上海從事譯經工作，次年即創立「上海文學與科學會」，每月召集學人聚會交流，並印行學報。不久，該會更名為「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」(North-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)，裨治文自任會長。

1850年4月，裨治文與夫人在上海創辦了裨文女塾(Bridgma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)，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學校，開中國女子教育之先河。「宋氏三姐妹」的母親倪桂珍就是從該校畢業的。



從網頁下載「裨文女塾」的外貌

六、裨治文與中國醫藥傳道會

1838年2月，裨治文聯同美國公理會的醫療宣教士伯駕醫生(Peter Parker)，以及宣教士郭雷樞(Thomas R. Colledge)等人，在廣州發起組織「中國醫藥傳道會」(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)，目的在「呼籲歐美各國差會派遣更多醫生來華，藉行醫和開設醫院推廣福音工作」。當時參加成立典禮的有十多人，裨治文被公推為副主席。該會在聯繫早期醫療宣教士方面，發揮了很大的作用，雒魏林(William Lockhart)、合信(Benjamin Hobson)和麥嘉締(D. B. McCaetee)等多位在中國教會史和醫學史上都屬重要的醫療宣教士，也曾是中國醫

藥傳道會的成員。

七、裨治文與禁煙運動

1839年3月10日，湖廣總督林則徐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抵達廣州，頒令嚴禁外商販賣鴉片。為瞭解西方的政治、法律、經濟、歷史和風俗，林則徐特意聘用了四位華人為他翻譯外國書刊，並為他作傳譯，其中一位就是梁發(中國第一位牧師)的兒子梁進德。由於梁進德是裨治文的學生，所以林則徐曾派梁進德走訪當時仍在澳門的裨治文，請他前往廣州相敘，以及協助林則徐把一份照會交給當時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(Charles Elliot)，並請義律轉呈英女皇，期盼英女皇禁止種植罌粟，使鴉片商人無法毒害中國人民。裨治文將這份照會的全文一字不漏地登載於1839年5月的《中國叢報》，他同時還在報上發表了一項聲明說：「我們要揭發英國，因她帶頭從事鴉片貿易。這個號稱是開明的、跟從基督的國家，竟給尚陷在黑暗中、信奉異教的中國種植和生產有害的東西，且以此(鴉片貿易)補充她的國庫。這顯示了最奇怪的道德顛倒。我們深信，這個以善行和信仰原則作為基礎的基督教國家，將會為她自己所做的事情——相對地與她當有的責任和榮譽不符的事情——遭受長期的苦楚。(英國政府)在一個異教的政府面前行事如此沒有原則，這只會使他們(中國人)在反抗基督徒時落入不道德的試探中。」

1839年6月3日，林則徐下令將查獲的英商販賣的鴉片在虎門銷毀，裨治文是應邀前往現場觀看銷煙的西方人士之一。在林則徐呈予道光皇帝的奏摺中，是這樣提及裨治文等人的出席：「臣等欽遵諭旨，將夷船繳到煙土二萬餘箱，在粵銷毀……其遠近民人來廠觀看者，無不肅然懷畏。並有咪喇堅之夷商金(King)與別治文(即裨治文)、弁遜(Benson)等，攜帶眷口，由澳門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師提標游擊羊英科遷稟，求許入柵瞻視……」。

裨治文也將林則徐在銷煙現場所說的話，刊

載在《中國叢報》上，其中有云：「凡經營正當之貿易與夾帶鴉片之惡行確無牽涉之船隻，應給予特別優待，不受任何連累。凡從事私售鴉片之船隻，必嚴加查究，從重處罰，決不寬容。總而言之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善者不必掛慮，如常互市，必無阻撓。至於惡者，惟有及早離惡從善，不存癡想。」

此外，裨治文也不時在《中國叢報》上撰文支持林則徐的禁煙運動，而在其巨著《廣東方言撮要》的第六章中，更將林則徐頒佈的禁煙令全文登載出來，可見他對林則徐的禁煙之舉是積極支持的。



簽訂《中美望廈條約》的石桌，至今仍存留在澳門

1844年7月5日，中美雙方談判，清廷方面的代表為耆英和潘仕成；美方代表是特使顧盛(Caleb Cushing)，而裨治文則作為顧盛的譯員之一，參與了條約的擬定與翻譯工作，結果是「中美望廈條約」的簽訂。其中第十七條款規定，基督教可在五個開放口岸設立禮拜堂並傳道。有論者認為該條款得以納入此條約中，與裨治文等人在中國民間所作出的貢獻，以及他們與滿清官員之間的交情不無關係。由於耆英和潘仕成兩人，以及潘仕成的父母家人，皆為美國醫療宣教士伯駕醫生的病人，通過接觸與交往，他們對西方宣教士存有好感。因此，當美方爭取在中國的宣教權益時，耆英和潘仕成並沒有提出反對，而且在他們呈交道光皇帝的奏摺中，也沒有提出強烈的反對理由。故有論者認為，這些與裨治文在早前支持清廷禁煙，與滿清官員建立一

定程度上的相互瞭解有間接的關係。

八、最後日子

1852年2月3日，裨治文因病無法繼續工作，於是在妻子伊莉莎的陪同下，乘船離開中國，回美休養。這是他們在華工作30年中，僅有的一次休假。在美國逗留期間，裨治文無法忘懷在中國的事業，因此只在自己的家鄉住了短短四個月，便於同年10月12日離開美國，於翌年5月抵達上海，隨即投入到譯經、寫作、學術及外交等工作。

1861年9月，裨治文罹患痢疾，延至11月2日，終因不治而在上海家中逝世，終年60歲。自其回應呼召來華，至此歷30年之久。裨治文逝世後，其妻伊莉莎返回美國一段時間後再度來華，並於1864年在北京燈市口創辦了「貝滿女校」，以紀念亡夫裨治文。1945年時名為「私立貝滿女子中學」。1950年代之後，該校先後更名為「五一女中」、「北京市第十二女子中學」，現為北京166中學。貝滿女中為中國培育出許多英才，原衛生部部長李德全、作家謝冰心，以及原上海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等人，皆出自貝滿女中。

斯人去矣，但裨治文在世時為中國社會和人民所作出的貢獻，為後人所記念。他不僅把基督福音帶到中國，也以真理和科學啟迪了中國社會。他一生正如其名，注重「治文」，不愧為溝通中西方文化的「搭橋人」(Bridge-Man)。

資料來源：

1. 李亞丁主筆《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》，見www.bdc-online.net。
2. 趙維本著，《佳蹤重尋》。新加坡：新加坡神學院，2007年出版。
3. 魏外揚著，《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》。台灣：宇宙光文字部，2006年出版。
4. 蘇精著，《上帝的人馬：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》。香港：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，2006年。
5. 相關網絡資料。

(作者為教會歷史學者，現居北美，從事寫作、教學與宣道)